

浙江籍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贡献¹

金延锋

(中共浙江省委 党史研究室, 浙江 杭州 310025)

【摘要】: 介绍了浙江籍先进分子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及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做的特殊贡献, 进而分析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原因, 为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浙江; 先进分子; 早期; 传播; 马克思主义; 贡献

【中图分类号】: D2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 (2018) 04-0061-07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 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 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开创者, 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中国经过五四运动后, 新思潮大量涌现, 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 其中尤以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浙江籍先进分子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们努力学习并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本文从浙江籍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原因以及特殊贡献三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旨在了解浙江籍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过程中所做的工作。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十月革命胜利后, 中国掀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在这一高潮中, 浙江籍先进分子成为最为活跃的群体, 他们通过创办报刊、著书撰文、翻译经典著作以及深入工人群众等方式和途径, 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一, 以报刊为阵地, 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

浙江籍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一, 就是创办各种报刊, 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向广大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

由浙江籍留日学生同乡会发起创办的《浙江潮》, 是中国较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之一。《浙江潮》于1903年在日本东京创办, 现存10期, 是当时全国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革命报刊之一。1903年10月, 《浙江潮》第8期上发表了署名“大我”的文章《新社会之理论》, 简要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

¹[收稿日期]: 2018-05-24

[作者简介]: 金延锋(1956-), 女, 山东烟台人,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网络出版时间: 2018-06-26 10:13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ri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80625.1725.012.html>

十月革命胜利后，浙江籍先进分子及时向国人介绍十月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的苏俄情况。他们在上海、北京、广州以及浙江等地创办了一批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有《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北京有《京报》，广州有《劳动与妇女》，浙江有《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这些当时比较著名的报刊，都是浙江籍先进分子主编的。

《星期评论》创办于1919年6月8日，主编是沈玄庐和戴季陶。在《星期评论》社工作或为刊物撰稿的浙江籍先进分子还有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杨之华、沈仲九、刘大白等人。《星期评论》自创刊到1920年6月6日被迫停刊，共出53期，总计发表诗、文400余篇，是五四以后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之一，与同一时期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一起被誉为“三大评论”之一。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创办于1919年6月16日，主编邵力子。浙江的陈望道、沈玄庐、刘大白、夏丐尊、施存统、杨贤江、沈雁冰、杨之华、曹聚仁等都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觉悟》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报纸副刊。

邵飘萍在北京创办的《京报》，是五四运动以后北方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京报》创办于1918年10月5日，1919年8月21日被当局查封。1920年9月17日复刊。《京报》复刊后，不仅热情歌颂十月革命，介绍苏维埃俄国的真实情况，而且还发表或译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舆论阵地。

《劳动与妇女》是沈玄庐于1921年2月13日在广州创办的一份杂志，其总发行所设在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报《广东群报》社，它是沈玄庐在广东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

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上海、北京、广州创办报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浙江省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的报刊也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其中最著名的是《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

《浙江新潮》于1919年11月1日出版，是浙江最早受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11月7日，发表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触动了中国社会封建伦理根本，引起了极大震动。浙江军阀政府下令查封刊物。12月2日，北京政府密电各省查禁《浙江新潮》。但《浙江新潮》社没有屈服，他们把第三期稿子送到上海，由《星期评论》社代为印刷。《浙江新潮》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在全国颇有影响，除在本省发行外，在哈尔滨、广州、成都、长沙、南京以及日本神户都设有发行点。

《钱江评论》是继《浙江新潮》后，在浙江更进一步主张社会改造、鼓吹宣传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该刊由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以下简称浙一师）学生曹聚仁等人于1920年1月1日在杭州创办，到6月20日共出版了13期。该刊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文章不署名，理由是反对为个人名利撰文、打破偶像观念、鼓励作者畅所欲言。但该刊在“一师风潮”后所发表的一些文章显然出自已有初步共产主义信仰的知识分子之手，如《“共产主义”与“人情”》及关注农民问题的一系列文章。

除了《浙江新潮》《钱江评论》外，浙江各地的进步报刊还有二三十种之多。这些刊物对推动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著书撰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

在创办报刊的同时，浙江籍先进分子还撰写专著和文章，广泛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最早以专著形式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人是邵飘萍。他在1919年冬到1920年夏撰写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专著。为什么要用专著的形式来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呢？邵飘萍在《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的绪言中，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自己撰写此书的原因和目的：

一是使国人正确理解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早已超越疆界，具有广泛的国际意义，“对此世界空前之奇剧，生活于此世界中之国民，胥不可不具正确之理解”。

二是外交需要。“俄之壤土，与我国西北相接，……政府于国民欲求对俄外交上之适当，自以研究俄事为第一需要”，“为政府外交、国民外交万分之一助”。

三是帮助国民了解苏俄真相。“国人对于俄事深为注意”，但又“苦于难悉俄事之真相”。以致“对于革命后之俄国，每疑为奇离怪诞，非人间食语”。因此撰写此书是为使国人有“判断俄事之常识”，勿为“不尽实”之言所惑。

四是批驳军阀当局对十月革命的污蔑。不但不见官厅对俄事有缜密沉静之研究，而且时有无识浅薄之言“预防过激思想”，“盲从日人故意曲解所加‘过激’之名词，发为神经过敏之愚论”。所以“举革命后劳农新俄国之政治经济社会外交革革诸大端”成《新俄国之研究》。^{[2]147-148}

除了撰写专著，邵飘萍还以复刊后的《京报》为阵地，不断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新成就。如在《京报》连载与他人合编的论著《俄国大革命史》《改造世界之人物》等，还连发6篇专论，介绍俄国各方面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客观地把列宁介绍给国人，为国人进一步了解苏维埃俄国提供了真实情况。

邵力子在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同时，也撰写发表了各类署名文章约有950篇，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专论马克思主义的，如《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马克思底思想》等。

沈玄庐在创办《星期评论》的过程中，亲自为《星期评论》撰稿120多篇，约占全刊稿件的1/4。他在广州主编《劳动与妇女》时，也经常自己撰文，从现存的8期76篇文章来看，有38篇出自他的手，占到1/2。

此外，陈望道、刘大白、夏丐尊、施存统、杨贤江、沈雁冰、戴季陶等都撰写了许多文章，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潮等。如陈望道在1920-1924年间，在《觉悟》副刊上就发表了近200篇文章，其中有许多文章也是专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第三，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

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让国人更加准确、深入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浙江籍先进分子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2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宣言》用鲜明透彻的语言阐述了一个新的世界观，为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行动指南，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革命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

1920年2月，在邵力子的推荐下，陈望道应《星期评论》主编之一戴季陶之约，回老家义乌分水塘村翻译《共产党宣言》。从2月至4月，陈望道以日文本为主，同时参考英文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翻译工作，这是中国第一部中文全译本。译稿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后，于同年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立即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一再翻印，广为传播。

陈望道除了翻译《共产党宣言》外，在1919-1921年期间，还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以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解释》《劳动运动通论》《劳工问题的由来》《社会主义的意义及其类别》等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文章。

沈雁冰在从事文学创作和编辑工作的同时，也积极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俄政治文化概况的文章。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的出发点》以及罗素的《游俄之感想》《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等等。

除此之外，施存统、郑振铎也积极开展翻译工作。施存统为陈独秀、李大钊等发起组织的“新时代丛书社”翻译了《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两本书。到日本留学后，也经常向国内寄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文。从1920年7月到1921年12月回国，施存统先后翻译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河上肇等人的文章9篇。郑振铎翻译的列宁《俄罗斯之政党》《对于战争之解释》两篇文章，是列宁著作中较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文章。此后，郑振铎还翻译了一些介绍苏俄军事、生产、文化等情况的文章。

第四，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就开始关注工人斗争，并对其给予高度的肯定与赞扬。为了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和联合，浙江籍先进分子积极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号召他们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

陈望道是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先行者。他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启发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俞秀松、邵力子、沈玄庐、郑振铎等也都撰写文章，从各个方面对工人进行启蒙宣传。

在撰文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同时，浙江籍先进分子更注重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宣传，研究如何帮助工人开展劳动运动。俞秀松是中国知识分子中较早自觉、主动地深入工厂当工人、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先行者。他在上海厚生铁工厂劳动了三四个月，还与陈独秀等人发起成立了上海机器工会。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等人也都参与了工人运动。这一方面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转变，也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浙江籍先进分子还积极参与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论争。

二、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特殊贡献

浙江籍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特殊贡献，应该说主要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准备，这些已经有不少文章进行过论述。在此，主要想通过介绍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在全国来说属于“第一”的人和事，以此来看其特殊贡献。

第一个把马克思著作《资本论》完整传入中国的是浙江籍的马一浮。1903年，马一浮应聘担任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秘书。在美期间，他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尤为喜欢。1904年，马一浮转赴日本自费留学，在日期间，他买到一部德文版的《资本论》。同年底回国时，他将书带回国内，送上海国学扶轮社收藏，准备翻译出版。后该书几经周折，又回到马一浮手上。马一浮后来来到浙江大学讲学，遂将这部《资本论》赠给浙江大学。这是第一部进入中国的马克思著作，对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马一浮为早期介绍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学说的是浙江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朱执信。朱执信1905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担任《民报》的编辑工作。1905至1908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宣扬革命，

宣传反清救国，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初步探讨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1906年1月，朱执信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第一次比较详细、客观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及他们共同创立共产主义学说的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并对《资本论》进行了评述。

第一个向国人介绍十月革命的是邵力子。在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邵力子根据伦敦和彼得格勒等地的消息来源，在自己主编的《民国日报》“要闻版”头条位置，以《美克齐美占领都城》的大号标题，配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改变》的副题，最早在中国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

第一个以专著形式全面系统地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是邵飘萍。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因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受到军阀当局缉捕，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悉心学习和研究各国的社会思潮，研究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情况，撰写了《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和《新俄国之研究》。《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分为上下两篇，共6章31节，于1920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俄国之研究》全书共24章，约8万字，于1920年8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是当时中国少有的一本专门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在各方面政策、成就的著作，因此一经出版，立即销售一空，到1927年3月，该书共出了三版。

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共产党宣言》全文翻译成中文的先进知识分子。《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重要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得到广泛传播。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所以，《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富矿。从这个角度讲，陈望道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贡献是最为特殊的。

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探析

浙江籍先进分子为什么能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不少方面还走在了全国前列？可以从历史发展、地域条件、理想志向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从历史发展看，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浙江籍先进分子，都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发轫者。

五四运动爆发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圈”，在众多的领域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浙江籍先进知识分子勇敢地投入到这一浪潮中去，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如蔡元培、沈尹默、钱玄同、鲁迅以及邵飘萍、沈雁冰、沈泽民等，他们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的全面出击。

五四运动的爆发，更是与浙江籍先进分子密切相关。蔡元培、邵飘萍是五四运动的开头人和发轫者。

蔡元培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学生是拉开五四运动巨幕的主力军，而向北大学生发出战斗召唤的就是蔡元培。1919年5月2日，蔡元培得到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后，立即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和班长开会，通报情况，并决定5月7日在天安门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后因情况突变，游行提前于5月4日举行。蔡元培虽然不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正是他对北大学生发出了战斗召唤，才导致了爱国学生运动的爆发。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爆发显然起了引导作用。当运动爆发后，他毅然以辞职、出走来回抗军阀政府对学生的迫害，为五四运动推波助澜。

除蔡元培外，时任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民》杂志社顾问的邵飘萍是五四运动的又一位发轫者，他在五四运动的思

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上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1919年5月3日晚上，邵飘萍在北大等十几所学校学生代表集会上发表演说，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和当前形势，呼吁学生们“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②会后他连夜赶写新闻稿，报道5月3日晚上学生集会的消息并加以评论。邵飘萍成为事前报道五四、事前评论五四的第一人。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两个月中，邵飘萍共发表署名文章40余篇，在思想上影响着运动的发展方向，为五四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当时在北京的钱玄同、鲁迅、郑振铎等人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或关心着学生反帝爱国斗争。

在上海，是邵力子首先点燃了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斗争的熊熊烈火。5月5日，邵力子得知北京学生爆发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连夜撰写并编排好关于五四运动的新闻稿，次日清晨带报纸到复旦大学宣读，并充当学生顾问，分析形势，指点方略，发动学生联络工学商各界进行声援。邵力子在发动、组织学生和社会各界投入五四运动的同时，还在《民国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时评，呼吁民众在斗争中要牢牢抓住惩治卖国贼、力争主权这个根本问题。邵力子自始至终参加了五四运动。他是上海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动者，罢课、罢工、罢市斗争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宣传舆论战线的出色战士。

北京、上海的浙江籍先进分子积极发动、热情参与五四运动之时，浙江省内的先进分子也奋勇地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浙江最早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是杭州之江大学，继而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并成立了杭州学生联合会，创办《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指导各校罢课、示威游行等爱国活动，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嘉兴、宁波、绍兴、台州、温州、金华、衢州、丽水等地学生也纷纷响应。学生们通过集会、演讲、罢课、抵制日货等多种形式，来唤醒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是全省教育界的核心人物。他积极提倡新学，推行教育改革，提出“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使学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的中心。浙一师学生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都成为浙江声援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浙一师教师刘大白、陈望道、李次九和夏丐尊等支持学生解放思想，积极推行以反帝爱国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

第二，从地域条件看，浙江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毗邻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之一——上海。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以北京为中心，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南方以上海为中心，1920年5月，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4]47-48}

浙江毗邻上海，自古就往来密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都深受上海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都能在第一时间传到浙江，而且浙江有许多青年人都在上海求学谋事，能直接参与各种活动。同时，他们又能及时地把各种信息反馈回浙江。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5月6日，刊登北京学生爱国运动消息的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就传到了杭州，这为杭州乃至浙江全省的学生爱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时间上的保证。5月21日，北京、天津、上海学联代表到达杭州，向杭州学生介绍和通报了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进一步推动了杭州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在上海的沈玄庐一方面投身于上海的声援斗争，一方面不断地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刊物送往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激励青年学生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

浙江先进分子还积极介绍和推送全国、特别是上海的进步报刊。浙江省教育会创办的《教育潮》，每期都有大量篇幅介绍《新青年》《星期评论》《湘江评论》等进步报刊。1919年八九月，《教育潮》和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先后成立了全国报刊

^②①转引自《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79：20。

销售处和书报贩卖部，《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报刊成为最畅销的刊物。这些进步刊物在浙江的广泛流传，进一步推动了浙江先进分子的思想转变，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三，从理想志向看，浙江籍先进分子都是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4148-49]而这个明显特点，在浙江籍先进分子身上也得到充分体现。

邵力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热切表示：愿意“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①。他非常强调人们应该坚信主义、忠于主义，他说：“能促进人们努力向上的是什么？只有‘主义’。有了主义，就如同航海者得到了罗盘针一样，能朝着他目的地前进。有了主义，然后在进行的途中，虽有种种困苦艰难而能自慰藉，精神越发振奋。有了主义，然后能权衡轻重，遇着万不得已时，宁牺牲个人的暂时的幸福，以谋全体的久远的幸福。”^{②3}

邵飘萍在《新俄国之研究》指出：“俄国今日所实行之社会主义，非独在俄国之政治与社会中为空前之创举，实世界历史上之一新纪元。今后果见社会主义之成功，其影响于世界，将较诸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威力为尤著。”^[2149]这与当时李大钊的思想不谋而合。

沈雁冰早在1919年4月就著文指出：“俄人思想一跃而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2157]

通过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的浙江籍先进分子，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1920年2月陈独秀到上海后，沈雁冰、邵力子、沈玄庐就和他取得了联系，酝酿在上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维经斯基到上海后，俞秀松担任他的助手，协助他做了大量工作。维经斯基召开了几次座谈会，沈玄庐都参加了。四五月份，陈独秀也在上海组织了几次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改造问题的座谈会，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刘大白、沈仲九、沈玄庐、沈雁冰、杨贤江、戴季陶等都先后参加过座谈会。1920年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参加研究会的浙江籍先进分子就有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沈玄庐和戴季陶（戴季陶不久就退出了研究会），占了研究会总人数的1/2以上。杨贤江、刘大白、沈忠九也参加过研究会的几次活动，他们都直接投身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项工作中去。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上海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这5人当中，有两位是浙江人。后经征求李大钊意见，党的名称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经济酝酿和准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起组织正式成立，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先后参加上海共产党早起组织的有17人，其中浙江籍先进分子就有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沈玄庐等7人。

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历史使命，是浙江籍先进分子投身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实践中的共同理想志向。上海共产党早起组织的成立，为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迈开了实质性的一步，使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有组织的实践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①转引自朱顺佐《邵力子传》，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80。

^②见《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4月7日。

-
- [1]毛泽东. 论人民民主专政[M]//毛泽东选集：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 [2]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 [3]习近平.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2）.
-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1卷（1921-1949）[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5]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1卷[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6]江娟. 浙江革命（进步）文化名人传略[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